

第六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会议综述

闫安朝

2019年8月15日至8月16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主办,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银川西夏陵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六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在宁夏银川召开。本届论坛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日本神田外语大学、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等国内外60多家单位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内容涉及西夏文献整理研究、西夏考古文物、西夏文化与艺术、西夏历史地理、西夏语言文字与西夏文献电子化等诸多方面。论坛共分历史文献、语言文字、文化考古三个分论坛进行讨论,与会专家积极参与讨论,相互深入交流学习。现就会议论文分类综述如下。

一、文献考释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大量西夏文献的公布,对西夏文献进行考释研究便一直是西夏学的研究热点。本届论坛中,文献考释研究方面的论文占有很大比重。其中世俗文献解读类文章有九篇,佛教文献释读类文章有十五篇。

世俗文献解读方面,法律条文研究两篇,经济、契约文书研究三篇,医药文书研究两篇,教育类两篇。戴羽、李语《〈亥年新法〉庚种本卷十四考释及价值略论》对《亥年新法》卷十四的庚种本进行了全部录文及考释,认为它是对《天盛律令》保辜制度的重要补充,补充了《天盛律令》卷十四的缺损内容,具有一定价值。孔祥辉《俄藏 ИHB.No.6740 号〈天盛律令〉残页译释研究》通过对俄藏 ИHB.No.6740 号文献中《天盛律令》文本条目的录释整理,对西夏文《天盛律令》卷九所缺部分内容作补充,从而使《天盛律令》中有关刑事诉讼、司法程序及西夏盟誓文化等方面内容更为充实。史金波《俄藏 5949-28 号乾祐子年贷粮雇畜抵押契考释》对藏于俄国的 5949-28 号乾祐子年贷粮雇畜抵押契进行译释,然后对契约内容进行解析,并论述了契约在立契时间、

作者简介: 闫安朝(1993—),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和西夏学研究。



雇租牲畜、利息计算和草书书写方面的特殊性,最后分析契约反映出西夏黑水城地区社会经济的真实而复杂的状况。潘洁《从敦煌、黑水城文献看唐至西夏的水权》通过对敦煌、黑水城文献的考察,分析出唐、西夏水资源使用权的获得、分配和转让,以及二者之间的承袭和变化。田晓霁《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典地契研究》通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5147号文书中包含的4件典地贷粮契进行完整录文及译释,结合《天盛律令》与唐末敦煌典地契对比,发现西夏在质押类型、收息方式、地上财产归属、抵押周期以及“牙人担保”制度方面与敦煌契存在区别。同时将典地契与土地买卖契对比,发现西夏晚期天庆至光定年间地价基本稳定在单亩价值2斗杂粮的水平。但自然条件优渥的肥壤良田价值明显居高,高出同时期普通土地近7倍的价值,反映出黑水城地区较大的农业生态差异。汤晓龙、刘景云《西夏文医方“虎骨散”考释》通过破译考证西夏医方“虎骨散”,并与传世中医相关文献比较研究,认为西夏文字无论文字偏旁结构还是读音均与汉字、汉音息息相关,中医传世医学文献中虽无相同的方剂,但其主治病症与服用法与中原医学文献中“虎骨散”相类似。进而认为西夏文字及西夏医学与汉文字及中原医学当是一脉相承的。梁松涛《黑水城出土6539号西夏文〈明堂灸经〉考释》首次公布了俄藏黑水城出土6539号文书录文、释读及汉译文,认为这个编号的三页西夏文文献为《天平圣惠方》中的《天医取师疗病吉日》《四季人神不宜灸》的内容,其依据的底本也可能是这两篇文献,主要内容为灸疗时的诸多禁忌。最后作者得出北宋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可能在西夏境内流传的结论。辛睿龙《英藏黑水城文献 Or.8212/1344 号写本〈蒙求〉残页考》在充分参考《蒙求集注》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俄藏黑水城 Or.8212/1344 号写本《蒙求》残页进行考释与整理,有助于探寻西夏人的“童蒙”记忆。苏红、朱亚琳《黑水城出土 Or.8212/1224 号文书性质探析》在对相关文书录文的基础上,根据文书内容,通过与《演禽通纂》的部分内容进行对比,对其性质作出判断,认为它是与星禽术相关的术数类文书。

佛教文献释读方面,汉传佛教文献释读有十二篇,藏传佛教文献释读有一篇。宋坤《四件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佛教文献复原与拟题考辨》对《密咒圆因往生集录》《金刚亥母求修仪轨集》《求佛眼母仪轨》及《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四件汉文佛教文献进行缀合复原,并对原编者在编号定名上存在的问题进行考辨,以期尽量恢复文献原貌。段玉泉《瑞典藏元刊西夏文大藏经再探讨》在前人对该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推论出文献中“当今皇帝”“皇太后”“正宫皇后”具体所指。推断出其大致时间应在至大三年十月至延祐二年三月。并对《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部分内容和《河西藏》做了考证。另外论文对瑞典藏《河西藏》出土于黑水城的观点提出初步怀疑。文志勇《西夏文〈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其他残经并与汉文本用词进行对比,使西夏文《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遗存形成一个完整的三卷本并对其进行译释,在译释基础上考证疑伪经内容来源。麻晓芳《〈佛说智炬

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 ИHB.No.6806 的不同来源的残片予以定名，并将《佛说智炬陀罗尼经》陀罗尼部分与此前已知两种残片缀合，旨在还原整部佛经原貌。胡永华《俄罗斯藏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残叶考》根据对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残叶的翻译，得出本残卷是由收藏者将《妙法莲华经序言》与《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硬性拼接而成的结论，另外又对经名中“莲华”做了一番考证。李浩霖《西夏文〈佛说斋经典〉残卷考》首先对西夏文中与“斋戒”对应的二字做了考证，又引出汉文佛经译本《佛说斋经》全文以便于对西夏文残卷进行了解和翻译，最后作了残卷对译。崔红芬、文健《西夏遗存〈弥勒上生经〉考略》分两部分对西夏遗存汉文和西夏文弥勒经典进行梳理和释读，考证了其译本类型和翻译成西夏文的年代。蒋超年《武威亥母寺遗址出土西夏文〈普贤行愿品〉残叶考释》对被初步确定为西夏文《普贤行愿品》佛经残叶的文本进行了译释和考证，认为此经是根据通行的《普贤行愿品》般若汉译本而来，应该是一个单刊本，且是目前所见的一种新版本。王龙《西夏译义净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研究》系统梳理了现存三卷四个编号的西夏文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并指出存世的两个抄件 ИHB.No.357 和 ИHB.No.2737 可以缀合为完整的卷十，最后指出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 Or.12380-2100 和 Or.12380-2101 的两件残叶实为《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残片。姜妍、邓章应《俄藏西夏文〈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六 1—20 折译释》采用夏汉对勘的研究方法，对西夏文《大般涅槃经》第二十六卷进行译释研究。马万梅《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讹误汇考》通过对《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初译本、校译本、重校本的对比分析，发现后期的校本佛经对前期初译本中的讹误现象进行了更补修正，同时对各类讹误情况归纳整理，并对致误原因作出解释。翟兴龙《西夏三十五佛文献版本源流考》探讨西夏时期三十五佛文献的版本系统问题和西夏时期三十五佛文献与明代《三十五佛名经》关系。卢嘉孟《俄藏 ИHB.No.4755 西夏文〈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上中卷考释》以俄藏馆册第 105 号为主，结合其他残经对西夏文《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进行录文、补正，并与汉文本用词进行比较。其次，在译释基础上，考证疑伪经内容来源。钟翠芬《从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看西夏佛经中的汉文化元素》对俄罗斯藏西夏文文献 ИHB.No.809《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进行解读，并尝试与唐失译本、相关俄罗斯藏黑水城几种汉文本作出比较。张九玲《藏传西夏文〈圣摩利天母总持〉考释》对西夏文《圣摩利天母总持》进行了录文，参照藏文本和汉文本对这部经书作了藏文转写、翻译和校注，并着重总结了经文中出现的藏式佛教术语。

此外，有陈广恩《日藏诸本〈事林广记〉》对收藏于日本的《事林广记》作了简要评介。



二、文物考古

文物考古是西夏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西夏学研究的另一热点。在与会文章当中,有关墓志碑文考释研究的论文有六篇,有关石窟、造像研究的论文有八篇。

墓志碑文考释研究方面,残碑缀合研究一篇,墓志考释研究五篇。孙飞鹏《西夏陵出土残碑缀补十例》在前人缀合、释考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夏陵7号陵西、东碑亭汉文、西夏文残碑进行了缀合研究,列出了部分缀合成果,为西夏历史、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份新材料。吴雪梅《一通被淹没的西夏遗民墓志——武威博物馆藏大元西凉高契郎之母墓志考述》通过对墓志的考述认为高契郎之母马氏为元代武威地区的西夏遗民,并通过对墓志、随葬物的考证总结出该墓葬的葬俗特点,将之与20世纪70—80年代武威地区发现的7座西夏时期小型砖室墓作对比,得出蒙元时期西夏遗民基本沿袭和保留西夏时期的丧葬风俗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探索元代武威西夏遗民去向同样有参考价值。孙宜孔《唐夏绥银宥等州节度左厢兵马使高谅墓志铭考释》结合相关史料对高谅墓志记载的高氏家族情况进行解读,订正高氏家族情况和相关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另外对高谅的仕宦经历作了详细的梳理考释,以期为研究唐朝回逃军将问题和唐德宗时期唐蕃关系问题提供资料。刘志月《试论菏泽博物馆藏两方元代西夏遗民墓碑史料价值初探》利用菏泽博物馆藏两方西夏遗民墓碑以弥补学界在研究察罕家族相关问题过程中的出土文献缺失问题。碑文反映出塔出可能于1274年定居曹州,揭示了元代西夏皇族的又一去向,展现了察罕家族的婚姻关系,补充了元朝官方对塔出与必宰牙的追赠。郑昊《国家决策与个人际遇——〈孙昭谏墓志铭〉中所见宋夏局势变化对北宋沿边武将军生涯的影响》分析了宋夏局势和宋对夏策略的转变与墓志中所见孙昭谏军旅生涯浮沉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引发关于国家层面的决策对当时中下层军官际遇所造成影响的思考。郭恺《墓志文献所见党项内迁前后丧葬习俗》着重通过对陕西、内蒙古出土党项贵族及汉族僚属等人墓志铭文献的分析,将党项的丧葬习俗进一步细化,并探讨党项内迁后丧葬习俗变化的原因。

石窟与造像研究方面,石窟壁画研究三篇,石窟题记研究两篇,石窟断代研究一篇,佛教造像研究两篇。常红红《东千佛洞第二窟真实名文殊曼荼罗及相关问题研究》讨论了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南侧之壁画,并将之定名为“真实名文殊曼荼罗”。认为西夏此类图像可能是由西藏萨迦派僧人在西夏弘法时传入。本文还探讨了西夏流行的另一种真实名文殊图像,指出此种真实名文殊乃是《文殊真实名经》的人格化形象,并进一步探讨了西夏时代的真实名文殊信仰。刘江《文殊山万佛洞〈弥勒上生经变〉图像研究》。刘文荣《榆林窟第20窟壁画所见弹拨乐器兼及金刚歌与三昧耶形考》。岳键、李国《关于莫高窟第130窟“谒诚口化功臣”的身份问题》通过对莫高窟第130窟两条题记的再解读,认为供养人“谒诚口化功臣”应为归义军河西一十一州节

度使张议潮,另一供养人为张议潮夫人——秦国广平郡宋氏;同时认为张议潮夫妇供养像并非表层图像,该窟表层壁画应为西夏早期绘制。公维章《瓜州榆林窟第19窟甬道西夏“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考辨》对瓜州榆林窟第19窟主室甬道汉文“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进行考辨,认为该题记并非大理国四人巡礼榆林窟时所留,并分析认为题记中的“大礼平定四年”应为西夏崇宗乾顺“天仪治平四年”,并认为题记中的“白惠登”应为回鹘僧。杨富学《晚期敦煌石窟分期断代要篇——裕固族初世史研究之奥义》从敦煌民族史的研究入手,最关键的是裕固族先民在敦煌的活动及其与石窟营建之关系,借由裕固族初世史的研究成果与石窟的仔细对比,以期解决在晚期敦煌石窟分期断代问题上的实际困难。周胤君、郭海鹏《从宏佛塔出土罗汉造像看西夏的罗汉信仰》通过分析宏佛塔出土的十八件罗汉头像及十二件罗汉身像的造像及结合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以探究西夏时期罗汉信仰相关的问题。林清凉、席鑫洋《杭州飞来峰第90龕大势至菩萨头冠中的宝瓶图像及其西夏渊源问题探讨》通过对飞来峰第90龕大势至菩萨头冠上的宝瓶造型进行认真考察,根据现有相关图像的比对考证,认为其与黑水城出土的绢本彩绘大势至菩萨(X2441)为代表的西夏宝瓶样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并进一步认为飞来峰造像无疑是受到了西夏佛教艺术的影响。

除上述两项较为集中的类别之外,尚有对西夏白瓷、佛经残片和西夏文纸本的研究。米向军《佑启堂藏西夏白陶及西夏白釉瓷浅析》简析了西夏瓷器中的白釉瓷的特点。杨红、刘菊梅《真面目的尽量深入触及——西夏文楷体金书〈大方广佛华严经〉残片研究》对西夏文楷体金书《大方广佛华严经》残片具体情况做了介绍。梁聪《康有为西夏文纸本藏品性质考订》通过对康有为2019年春季拍卖会上的半叶正反双面的镜心纸本西夏文文献的转录与释读,确定其一面为西夏文重校本《同音》的第6叶A面,并且是新出现的版本,进一步补充了《同音》的版本内容。

三、文化艺术

对西夏文化艺术的研究,能丰富人们对西夏社会的认识,另外它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重要价值。参会文章中对西夏文化进行研究的论文有六篇,研究西夏艺术的论文有八篇。

西夏文化研究方面,西夏文化产业研究两篇,文化融合与传播研究三篇。徐建华《关于宁夏西夏文化产业化问题的若干思考》就与西夏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和阐述,基于西夏文化产业化发展现状和政策趋势,对宁夏西夏文化提出了几点建议。孔德翎、马立群《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问题探析》认为西夏陵要想获得国际组织的认可,获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就必须从“遗产名称”“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遗产的申遗标准选择”等各个环节着手,并就此分别提出一些具体建议。陈连龙、李颖《传播学视阈下德慧西夏文〈心经〉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探析德慧民族身份及西夏文《心经》传播缘由,论述了德慧在翻译



过程中的传播主体意识、传播受众意识以及跨文化传播意识,并以夏、梵、藏本《心经》为例阐发德慧译者主体性的语言艺术。叶利阳《〈西夏汉文佚名诗集〉新释》通过诗集中的文典运用情况探讨西夏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融合。张雯《西夏王国的文化转移》将“文化转移”概念引入西夏历史文化分析中,并将西夏文化转移分为三个阶段。此外,陈育宁《西夏文化的形成及主要特征》一文对西夏文化的形成过程做了总体性概括,并对其主要特征做了总结。

西夏艺术研究方面,绘画研究三篇,书法研究一篇,雕塑研究一篇,纹饰研究三篇。史伟《略论西夏佛教石窟寺壁画艺术的多元化风格——以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窟为例》以东千佛洞第2窟为主展开讨论,分析了它的艺术风格,进而揭示了东千佛洞西夏佛教绘画艺术显密同窟主旋律下的凸显藏系密教特色的多元化艺术风格。王胜泽《风俗画时兴背景下西夏千手观音的图式之变》认为佛教绘画在宋代风俗画时兴的背景下深受影响,图式发生很大变化,并以西夏千手观音像为例证,说明画工将风俗画的手法通过借鉴、移植、重构,嫁接在佛教仪轨图像中,更大地实现了佛教的世俗化。何卯平《西夏佛教艺术的图像学征象:梁楷〈出山释迦图〉再议》从绘画程式现象入手,认为该图源自西夏佛教艺术。并由此推定梁楷作品的图式。赵生泉《西夏书法研究三题》认为“年代”意识不足,是制约早期西夏书法研究难以走向深入的关键因素。要尽可能的全面搜集和掌握“作品”,其次在“断代”基础上排比其先后谱系,以最大程度上还原出西夏书法的发展、演变轨迹。汤晓芳《西夏陵雕塑与自然人文环境》以西夏陵出土的雕塑作品为例,对雕塑与环境的关系作了考察。何晓燕《西夏陵砖饰研究》对西夏陵历次调查、发掘中,采集和出土的砖的纹饰进行研究,主要从砖饰纹样种类、砖饰纹样文化影响、砖饰纹样发展、西夏陵砖饰建筑艺术几方面作了考察。刘宏安《西夏瓷器上的纹饰图案与文字》通过从国内外百余件出土西夏瓷器标本上的纹饰图案与文字做分类对比研究,认为西夏制瓷技术发达,纹饰图案与文字既受中原文化影响,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陈彦平《灵武窑出土西夏褐釉刻花大瓶装饰图像考释》依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考察了灵武窑出土西夏褐釉刻花大瓶装饰图像的内容以及图像反映的主题。

四、语言文字

西夏语言文字向来是西夏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特色,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充分运用音韵学等学科的知识,对学者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仅是文献解读的必要前提,而且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映射出西夏人的精神世界,其兼有研究工具与研究对象两种属性。

本届论坛中,关于语言文字的论文涉及多个方面,其中语音研究一篇,修辞与语法研究两篇,文字与词汇研究五篇,文献数字化研究两篇。孙伯君、孟令兮《汉字音在日译汉音与党项语中变读形式的比较研究》认为日语和西夏语尽管不属于一个语系,但同属辅音韵尾不够丰富

的语言,音节结构相似,在标注唐、宋时期汉字音时所发生的音素的替代、增音、减音等变读有相同的趋势。借以说明不同系属的语言在与其他语言接触时,如果它们的音节结构相近,也会发生共同的变读,而这些属于共时变读的形式与历时演化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张珮琪《论西夏语动词第二类趋向前缀》认为在西夏语中存在的两组与趋向范畴有关的动词前缀中,第二组动词前缀除了表示希求意义外,还承担着其他功能,作者试图在大量文本的基础上,针对第二组前缀的功能及意义进行探讨,以期建构完整的西夏动词趋向前缀图景。方璐《西夏文〈贤智集〉“辩”文体中的修辞举隅》对西夏文《贤智集》“辩”文体中采用的修辞手法进行了考察。柳玉宏《〈同音〉三音节词研究》把《同音》中425例一个大字下有两个小字的情况称为“三字格”,这些“三字格”中有44例是三音节词,不计重复的是27个词,作者通过考释确定其正确的语序,并分析其结构方式。以纠正《夏汉字典》等著作对这些词语的理解,使我们对西夏语词语的结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刘贺、邓章应《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疑难俗字考释》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西夏写本Φ311《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进行研究,对文中因讹化、换旁、简化或草化等原因造成的20个疑难俗字进行考释。刘景云《西夏“新”“年”“福禄”文字联考》力求另辟蹊径,采用汉学传统小学方法,通过详细考察西夏“新”“年”“福禄”等文字,阐明西夏文字与汉文字的“本末同殊”,即西夏造字法。许鹏《论西夏文法律文献中的“边等”和“边等法”》从词汇学的角度进行切入,对《天盛律令》中的疑难词语“𐽄𐽀𐽁”进行重新考释,提出了“同等法”的新译,并将之代入文献加以验证,认为新译能使条文更简明清晰。荒川慎太郎《日本西夏学の回顧と展望》回顾了日本学界对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总结了对西夏字典研究的成果并分析了其对解读日藏西夏文献可能存在的作用。关于西夏文献数字化方面有贾常业《西夏文楷书正字字库的安装与使用》对新的西夏文楷书字库“Tangut201904”进行了简单介绍。张光伟《基于深度学习的西夏文献数字化》探讨利用深度学习进行西夏文自动识别相关的方法,包括不同深度神经网络在识别手写西夏文中的性能,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的西夏文数据集的构建,以及从单个西夏字的识别到整列西夏字识别系统的构建,以期在西夏文的数字化提供一种高效且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柳长青《西夏古籍文献数字化研究》对西夏文献数据库总体结构作了归纳,并通过实例对西夏文献数据库检索工具进行了介绍。

五、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的研究是西夏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此次的参会文章中共有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章七篇,其中西夏地图研究的论文一篇,地望考证论文四篇,地名考证论文两篇。杨蕤《〈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补释》认为章巽先生应该是“西夏地图”绘制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或完成



者,地图的重要资料来源是传统史籍和《西夏地形图》,并考释和校正了其中的一些地名。文章指出西夏地图绘制过程中的北部疆界“模糊性”并非个案问题,而是在北方民族政权疆界划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梳理。并认为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将成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修订的重要信息补充和资料来源。高建国、李田田《宋夏宁星和市位置考辨》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宋夏在秦晋黄河段沿河关津渡口的设置、和市塌村的地理位置和明代和市里的存续,以及今和市塌周边较多的以“会”命名的村镇名称等综合因素,大体判断陕西佳县的“和市塌村”即为宁星和市的具体位置。李进兴《西夏南牟会行宫位置考》认为西安州城遗址与北城才是南牟会行宫所在地。王怀宥《唐宋时期的青石岭地望新考》通过分析文献和考古资料以及结合陇东地区的地形地貌,确定唐代的青石岭就是今天平凉崆峒区草峰镇至庆阳镇原县新城镇之间的山岭。而宋代青石岭所在位置为宁夏固原彭阳县青石嘴,已非唐代青石岭。张多勇《唐代党项静边州与庆州羁縻三州古城遗址考察研究》在系统对庆州、银州的古城遗址系统考察的前提下,确定唐代庆州静边州遗址和唐代银州静边州遗址的位置。并对古城遗址比对,确认了唐代庆州安置党项部落的三个羁縻州府的古城遗址所在。雷建忠、杜治文《提铃—麒麟—蹄林—蹄林考》认为在党项羌为主体的静边州十八羁縻州里,有铁勒思结别部的蹄林州。今天的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麒麟沟可能是静边州蹄林羁縻州旧址,麒麟—提铃,是蹄林之误。妥超群《喀罗川考辨——西夏卓罗和南监军司境内地名新证》经重新梳理史料发现喀罗川在《四库全书》本中的转译与旧本原名存在译音冲突,自《光绪重修皋兰县志》以后对宋地志中与喀罗川相关的“宗河”存在误解,因此认为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将喀罗川考定为兰州永登县庄浪河谷为误考,经作者再考认为喀罗川应为今兰州秦王川。

六、西夏历史研究

西夏历史研究是传统的研究领域,这一部分的研究涉及西夏历史的方方面面,能为我们展现西夏历史的总体面貌。下面分西夏政治、军事和宋夏关系、西夏文化、宗教、党项族群研究、经济、法律等方面对与会文章加以介绍。

西夏政治方面的论文有三篇:汤君《从中古“城主”的发展和演变看西夏“城主”官制》系统梳理了中古时期“城主”的演变和发展以便进一步考察西夏“城主”一职任用的详细情形。并认为,西夏时期首开“城主”入正式官制之风,且城主一职普遍存在于西夏的官僚体系之中,地位略低于西夏的刺史。刘维栋《西夏官员群体初探——以出使活动为中心》分析了定难军时期和西夏建国后的官员出使情况,发现以汉姓官员为主体的使臣群体在西夏出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对出使官员所任官职、所担使命以及其家族成分的考察能为分析西夏多元文化提供鲜活的例证。张林《西夏年号研究》首先梳理了西夏历史上年号的变动情况,其次总结

出西夏年号的特点：带“天”字的年号特别多，存在同年改元与逾年改元并存的现象。并认为前期改元频繁，后期改元较少，总结出的改元原因有：新君登基依例改元、重大政治事件改元、避讳改元、祈福消灾改元等。

军事和宋夏关系方面的论文共计五篇：陈瑞青《略论西夏军队中的“负担”》认为西夏早期兵制中的兵员构成是正军和负担，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发展成为正军和辅主，辅主又包括正辅主和负担，正军和辅主来自同一个家庭。正军是骑兵，处于主导地位，负担是步兵，不仅参加战斗，还承担大量军队中的杂役，具备战士、工兵和后勤保障兵等多重角色。另外，正军和负担之间角色可相互转换。王战扬《论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攻守理念的转变——以好水川之战的演进为中心的考察》认为宋朝在延州之战以后至好水川之战前，改革军事弊病，并在中央制定了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但一方面该决策未得到及时执行，另一方面因为情报的泄露，在好水川之战中，宋方面被迫守御。在此战之后，宋西北边防由积极进攻的战略转变为保守防御的理念。张银堂《宋夏对峙非对等态势与重文抑武国策关联度分析》认为西夏之所以在崛起之初就对宋保持军事优势，与北宋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没有必然联系。依据是宋重文抑武主要是防范高级禁军将领及地方军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北部、西北边疆重兵屯驻，从未放松过防守与反制。文武轻重是比较而言，重点在权力制衡。李桥《西夏“正军”相关问题探析》主要从府兵、使军的性质判定西夏正军的兵源和种类两个部分进行探讨的，考证了《天盛律令》“军持兵器供给门”前缺职业的性质，提出了西夏禁军这一概念，还对铁鹞子、擒生军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研究。尚平《960—1038年宋蕃夏在陇中地区的经营与矛盾》认为宋夏在宝庆元年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前，在陇中地区已存在对抗局面，北宋方面对陇中地区的经营以及元昊在陇中的推进造成了这一局面。为此，作者认为在宝庆元年之前宋对陇右地区的经营及宋夏关系因此所受到的影响也应当受到关注。

西夏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论文共计六篇：刘双怡《以“抄”为例再探西夏社会性质与结构》认为“抄”作为西夏基层组织单位，是观察西夏社会性质以及结构的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并且通过对比王安石的保甲法相关内容，以求发现其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李晓明《西夏时期的蒙学教育——以出土西夏蒙书文书为中心的探析》借助对西夏出土蒙学文书的研究解读，认为西夏蒙学教育的发展，除一定程度上继承敦煌学，吸收中原文化外，更多的是体现了自身元素，发展出适合自己特色的教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夏统治者发展文化教育的主动性和意识形态领域确立的自信心。郭明明《西夏文献中的“二十四孝”故事生成考略》考察了西夏文献中“二十四孝”故事的性质、发展历程与形成脉络，认为《圣立义海》中“二十四孝”故事的出现，可以解决学界在探讨辽宋金时期墓葬中的“二十四孝”图像之时缺乏文献的对照和参考的问题，对于西夏文献中“二十四孝”故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这一时期“二十四孝”故事的流传、发



展,以及儒家孝道观念和中原地区的风俗文化对周边民族政权的影响,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涵。蔡彤华《西夏婚姻观探究》阐述了西夏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的相关规定和流程,并试图说明这些道德规范形成的历史及社会原因。初步探讨了西夏婚姻观表现出来的民族特色和它所呈现出来的多层复合、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陈育宁《西夏文化的形成及主要特征》总结了西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立国前的漫长准备阶段、立国后的多次蕃礼与汉礼之争,在此过程中西夏文化逐渐成熟。西夏文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既保留了本民族特征,也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并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主要民族特征。安北江《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基于8—13世纪的王朝秩序思考》就中晚唐至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等作了概要性梳理,从地缘政治角度重释王朝政治秩序的演进。

宗教方面的论文有一篇:冯雪俊《西夏王朝的佛事活动探析》通过叙述、分析西夏王朝的佛事活动,以解读西夏佛教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等问题。文章认为,西夏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是西夏王朝统治民众、营造国家文化,构建西夏民族身份认同政策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之一。但是,佛教在后期西夏社会中所起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西夏的灭亡与其宗教政策的失误有一定关联,西夏佛教在西夏历史上起着精神文化领域的奠基石作用,是西夏统治者乃至王朝的国家凝聚力建设的重要因素,对后世中国西北地区的宗教文化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党项、女真族群研究方面论文共四篇:陈岑《史籍所见唐括异名考辨》通过对“唐括”异名及其成因的考辨,以纠偏正误并为进一步认识“唐括”的族属问题提供佐证。林皓贤《西夏国族的身分认同建构》主要讨论党项西夏如何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自己的国族身份认同以凝聚国民,保障其生存空间的问题。并尝试通过整理前人的研究与结合西夏文献来探索这一问题,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有关党项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中结合了儒家与佛教的文化,甚至还包括党项本身的故事在内。邓文韬《合法性的接续:元代昔里铃部家族构建沙陀认同的地方因素》认为昔里铃部源出沙陀贵种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可能只是昔里氏家族成员教化于12世纪末编造出来的谱系,以此来主观构建昔里氏的沙陀认同,论证自己统治大名路的合法性,谋取政治利益。此外,他们构建的家族谱系是从定居地即大名路地方文化资源中寻找的,他们找到了曾经在此完成了统治权力合法性建设的沙陀李氏家族,这种血缘认同的土著化,取代了元代唐兀人对河西故地的乡土认同,泯灭了他们区别于土著居民的自我意识,最终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张冷习《试论党项族拓跋氏在鄂尔多斯的兴起》论述了鄂尔多斯在党项族的兴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经济方面共两篇:王明前、王越《青白盐与党项马》认为西夏在与北宋的经济交流中利用青

盐和党项马的经济比较优势，在有效对抗宋朝经济遏制的同时，还能够通过榷场贸易，使之成为自身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杜艳梅《佛教教义下的西夏寺院经济理念研究》对西夏寺院经济理念进行重新审视，梳理了西夏寺院经济理念在佛经教义中的合理化体现，分析了寺院经济理念的演变，探讨了西夏佛教经济理念与佛教教义、世俗经济之间的联系。认为正是因为西夏佛教依据自身发展需要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自身的经济理念，主动调和与宗教教义、经济世俗性之间的关系，使之符合当时寺院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佛教信仰在西北地区的风靡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承载条件，以更好的接纳内外部的有利因素。

西夏法律方面共两篇：罗海山《西夏与中原各朝子孙卑幼财产权立法比较研究》分析了中原各朝关于子孙卑幼财产权的立法，认为在唐宋元的立法中，同居之卑幼一直没有财产权，明清时期在家长的允许下，子孙可以“别籍异财”，分家之后的子孙拥有独立的财产权。而对比西夏子孙卑幼财产权的立法，作者认为在西夏时期，至少是西夏后期，子孙卑幼具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处分权，尽管这一权利还处于家长权的笼罩之下。这是与唐宋元诸朝不同之处，也早于明清法律的规定。作者还初步分析了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高榕《天盛律令自杀立法初探》简述了《天盛律令》中的自杀立法和严惩自杀的律条，作者基于涂尔干的自杀理论进行推断，因为女性是自杀的主导者，因此也成了律法的首要打击对象，同时这也是西夏女性在法律权力上被迫失语的明证，作者根据涂尔干的理论进行推断，西夏待命者群体的自杀率可能高于普通军队，因此律令将针对待命者群体的处罚单列出来。另外，作者从女性困境、军事政体、宗教尤其是佛教影响等因素分析西夏立法否定自杀立场的根源。

此外还有鞠贺《末法思想与辽朝社会》，武文君、杨军《分镇边圉：辽朝部族军驻防研究》对辽朝的历史进行研究。鞠贺《末法思想与辽朝社会》以辽朝的末法思想为立足点和切入点进行探讨，解释了辽朝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象。武文君、杨军《分镇边圉：辽朝部族军驻防研究》论述了辽朝部族军存在的东南西北四大驻防区，并统计和计算了各驻防区的兵力部署情况。认为因驻防区内的部族多驻扎在有牧场的游牧区，所以部族军受牧场因素影响较大。

另，尚有对西夏学的发展作出总述性的概括的文章三篇，分别为：史金波《砥砺前行 发展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西夏学三大体系建设刍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西夏学界在构建西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作了全局性的总结，认为 70 年来的研究展示出中国西夏学的特色，肯定了西夏学研究在学科发展中做出了多方位的贡献。杜建录《西夏学的传承与发展》对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西夏学大致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作了概述，展示了中国西夏学发展的成果。李华瑞《评俄国近三十年的西夏史研究》则对近三十年来俄罗斯以克恰诺夫、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为代表的西夏学界的研究成果与动态做了介绍。



七、结语

综观这次会议，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诚如杜建录教授在《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指出“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翻译、考证又何尝不是呢”^①。西夏文献的发现与整理出版为西夏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且在此基础上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专题研究日益深化。在这个过程中，文献的释读也并非一蹴而就，本届论坛中的西夏文献考释研究、语言文字研究、历史研究中不少论文都是对文献的再次解读。这也说明单纯的文献解读与简单的考释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学术发展的要求，学术的发展必然是向深度、广度发展。

二、“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②。除了一些新材料的解读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本次论坛中也有所体现，如强调族群的“主观认同”与“自我建构”，借鉴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如涂尔干的自杀论来关照西夏社会的相关问题等。此外，虽然一些文章是老问题，但是也涌现出了新视角，新材料。如汤君《从中古“城主”的发展和演变看西夏“城主”官制》打通断代史研究，是很好的研究视角。敦煌文献和西夏有着密切联系，结合敦煌文献来研究西夏是非常好的角度，如潘洁《从敦煌、黑水城文献看唐至西夏的水权》。

三、在研究力量上，本次与会专家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西夏学前辈，也有一批年轻的、专业训练扎实的博士生、硕士生。研究地域上，除了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银川的宁夏大学，成都的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的西南大学，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石家庄的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的西夏学研究也崭露头角。此外，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美术、书法、文学等领域研究的专家从其专业角度来讨论西夏历史、文献相关问题，推动了学科的交融发展。当然，部分专家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中，存在缺乏学术史回溯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之，第六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较之往届涌现了不少新议题、新观点，展示了西夏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了西夏学的交流发展，对于西夏学的国际化也多有裨益。

（责任编辑：张笑峰）

^①杜建录：《西夏〈天盛律令〉》，《西夏学》第十三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

^②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